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2016年 10 月，頁175-209
國立台灣文學館

假面・戲弄・對抗論述：蔡秋桐〈帝君庄秘史〉的書寫策略*

陳龍廷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作為一個重要作家，蔡秋桐曾是一位日治時代最基層的地方政治人物。他以筆名「秋洞」，在1930年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帝君庄秘史〉。這篇小說的標題雖然可直率地理解為某個村莊的秘密歷史，但是該如何理解仍是充滿困難與秘密。「帝君」所指涉的是哪個真實存在的村莊，乃至如何詮釋這篇小說，以往一直是個問題。

顯然這篇小說是以台灣語文書寫的笑話與諷刺刻意展現的誇張放肆，甚至以鄙俗調侃作為其掩飾的面具。本論文將試圖逐字考察這篇小說的可能隱喻意涵。筆者懷疑其假具的目的，不僅是作為一種保護色以避免受到政治的控制，而且也是作為一種對抗論述，用以嘲諷1920年代台灣地方政客與政治制度的變革。

關鍵詞：蔡秋桐、書寫策略、地方政治、街庄、對抗論述

＊ 學者陳淑容是發掘蔡秋桐〈帝君庄秘史〉的第一人。這篇論文的原始動機，是來自當年就讀成功大學臺文博班時，曾給她有點強人所難的建議：或許可以從日治時代的地方政治人物深入解讀。十多年後，這些不成熟的見解只好自己來試寫，以拋磚引玉。本文初稿在匿名審查通過後，特別請淑容提供寶貴意見，承蒙她指正與謬讚：「已經遠遠超乎前行研究掌握的蔡秋桐圖像。從中國戲劇的假面與西方文學的戲謔理論切入，拉抬了論述的高度、層次，也凸顯〈帝君庄秘史〉重要的文學史意涵。在理論之外，又能夠搭配地方街庄的政經發展脈絡，從新聞報導、地形圖、職員錄等地互文解讀，解構小說中的虛構，再現不為人知的真實。」特此致謝。

Mask, Irony and Counter-discourse:

Chhòa Chhiu-tông's Writing Strategies in *Tè-kun-chng Pì-sú*

Chen Long-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hòa Chhiu-tông（蔡秋桐, 1900-1984）was a major Taiwanese writer and grassroots politici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Using the pseudonym, Chhiu-tōng（秋洞）, he published his first novel *Tè-kun-chng Pì-sú*（帝君庄秘史）in 1930. According to the novel's titl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novel is abou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Tè-kun" village. However, it is filled with difficulties and secrets to comprehend the text, such as where the actual location of the"Tè-kun" village was, and in what way to interpret the novel.

Obviously the writer employed the writing strategies such as gross robust humor, extravagance of caricature and jokes in Taiwanese as a disguise mask. This paper is intended a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ovel's metaphorical meaning literally. The researcher has doubt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mask is not only as a camouflage to avoid the political control, but also as a counter-discourse to satirize the local politicians and Taiwan government's reform in the 1920s.

Keywords: Chhòa-Chhiu-tông, Writing Strategy, Local Politics, Ke-Chng, Counter-discourse

假面・戲弄・對抗論述：蔡秋桐〈帝君庄秘史〉的書寫策略

一、前言

日治時代的小說家蔡秋桐（1900-1984），在戰後接受訪問時，對自己的小說做如下解釋：

> 我當時是保正，兼製糖會社原料委員，與製糖會社有來往，與警察也有聯繫，因此小說內容鮮有激烈的反抗意識，只是真實的紀錄一些事情而已。作品的主題，大部分是寫自己心裡的矛盾，全都是本地所發生的事情，只是名字更換一下而已，其人和事皆是真實的，沒有特意的去反抗。[1]

蔡秋桐正值初出社會，一展身手的時代。他1921年公學校卒業，開始擔任保正、製糖會社原料委員，1928年擔任五塊寮畜產組合長、1928年組織元長庄青年研究會，還有1929年擔任元長信用組合監事。[2] 據1934年的《臺灣人士鑑》，蔡秋桐擔任的職位更包括：[3] 保正、區總代、日糖地方委員、元長產組監事、農事實行組合長、元長公學校教育後援會長、五塊寮國語普及助成會長、嘉南大圳組合評議會員、北港米穀統制組合長（圖1）。這意味著

（現）臺南州北港郡元長庄五塊寮三四〇
【經歷】明治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現住地ニ於テ生ル元長公學校ヲ卒業シ更ニ學漢ヲ研究ス 日糖地方委員トシテ黍作製糖方面ニ本業ヲ持ツ傍ラ筆書ノホス如ク地方ノ爲メニ貢獻スル處又尠シトセス 讀書文藝臺灣在來ノ風俗研究ニ趣味ヲ有シ屢々文藝作品ノ發表ヲ見ル
【家庭】妻ノ外現在二男二女アリ

圖1　1934年《臺灣人士鑑》收錄的蔡秋桐

1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08），頁48。
2　陳淑容，〈論蔡秋桐及其新文學運動〉，溫彩棠編，《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南：台南市藝術中心，2000.12），頁351。
3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03），頁149。

北港元長一帶的製糖會社、農業組合、嘉南大圳等形形色色、不同層級的地方人物，必然都與蔡秋桐有所接觸。

如果說製糖會社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象徵之一，而警察，毫無疑問就是殖民主義的執行基層，那麼蔡秋桐作為一個臺灣知識菁英，置身於日本殖民警察、資本家與臺灣農民之間，內心難道不會有一點矛盾嗎？問題是這樣的矛盾如何表達？其次，他認為自己「沒有特意的去反抗」、「鮮有激烈的反抗意識，只是真實的紀錄」。所謂的「反抗」，可能是類似1925年二林事件之類的農民運動，採取激烈政治抗爭手段直接對抗殖民統治。相對於直接的政治抗爭，蔡秋桐的小說可能是另類的對抗，是在裝瘋賣傻的詼諧面具底下，再現出台灣社會底層的真實醜態。這種書寫的特質，葉石濤最直捷地指出：

> 以嘲弄、諷刺的筆觸，最徹底地把土地和農民的關係闡釋得最為清楚的莫過於終身居住在農村，直接間接地與農民為伍，熟悉他們的困境的作家蔡秋桐了。[4]

但是，閱讀蔡秋桐小說的經驗，卻很難直接跟西洋文藝思潮的寫實主義放在一起。蔡秋桐小說裡的「寫實」，指的是「人和事皆是真實的」，至於其創作手法，則是「名字更換一下而已」。換句話說，名字雖已被刻意變造，而事件卻可能真實發生。文學創作去描寫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最困難的倒不是如何描寫刻畫的問題而已，而是如何避免當事人對號入座，甚至讓書寫者可能因而落入官司纏身、對簿公堂的窘境。採取某些偽裝或文學修辭的書寫策略，不失為明智之舉。例如〈保正伯〉所刻畫的「李さん」[5]，雖然活靈活現，但是名字可能早已被置換，那麼要找到小說人物的原始模特兒，反而是很困難的大工程。無論如何，這卻也是解讀蔡秋桐小說一條很重要的線索。

本文將討論蔡秋桐的第一篇小說〈帝君庄秘史〉。這篇小說從昭和5年（1930）12月4日至昭和6年（1931）4月16日，以「秋洞」筆名發表在《新高

4 葉石濤，〈文學來自土地〉，《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07），頁9。
5 蔡秋桐，〈保正伯〉，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二冊・一群失業的人）（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頁294。

新報》，分十回連載，長達約一萬四千字左右。放在個人生命史來看，小說發表時作者30歲，也已擔任十年的保正、製糖會社原料委員。這篇小說所描寫刻畫的，恐怕是他初出社會之際，對光怪陸離的台灣地方政治現象最直率的觀察與戲謔嘲諷。表面的怪誕色彩應該是一種小說保護色，而使得書寫者更得以自由揮灑。在如此成功的書寫策略之下，原始意旨反而可能如此隱諱而不易辨認，因而除了史料發掘，被學界討論的並不多見。[6]

〈帝君庄秘史〉的小說書寫風格，讓人想起文藝復興時代法國文學家哈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哈伯雷身處於變革的時代，所面對的創作環境仍是很嚴格，稍有不慎，可能必需面臨被查禁的困境。無獨有偶，蔡秋桐在1931年的小說〈放屎百姓〉，曾相當直白地表達出「發哥」的困惑：「農也做，商也做，工也做，怎樣逐日得不到三頓飽？他愈想愈不明白，他也沒有像人去上菜館，也沒有賭博過，又是勤勞、又是儉省，怎麼愈做愈窮？」結果目前僅能看到刊出這篇小說的上半部，而其餘則被新聞檢查人員腰斬。相對於過於直率地強調農民生活困苦而淪為被查禁的創作，更顯得1930年這篇〈帝君庄秘史〉書寫策略的特殊性。如果要描寫殖民者帶來地方政治光怪陸離現象，甚至將台灣總督以降至庄長等政治人物都加以嘲弄一番，而且還能躲過檢查、逃過禁刊的命運，順利成為可讓讀者欣賞的作品，那麼思考它如何藉著文學的修辭技巧，以及小說文體所特許的虛構想像來傳達，應該是個相當有趣的課題。

哈伯雷曾經採取將自己姓名字母重新排列組合，而以Alcofribas Nasier為筆名來發表作品。置身於社會嚴格控制，隨時可能都要面對宗教審判的危險時代，這應該是一種必要的安全機制。哈伯雷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包括*Pantagruel*（1532）、*Gargantua*（1534）等系列的《巨人傳》，融合了中世紀的鬧劇（farce）、民間傳說故事，使得整個小說讀起來，好像經歷一場奇幻旅行。例如*Pantagruel*第32章，Pantagruel征討敵人時，突然遇到豪大雨，他命令

6 蔡秋桐曾收藏自己所有作品的當年剪報，葉石濤老師曾多次提及已遺失的憾事。至今仍缺乏蔡秋桐全集的整理發行，因而相關研究似乎也很遲緩。早期研究者僅能依據遠景的套書，而將1931年的〈保正伯〉視為第一篇小說。後來隨著史料挖掘，終於才能確定蔡秋桐最早的作品應該是1930年的〈帝君庄秘史〉（陳淑容，2000年）。對這篇小說的解讀，歷來研究者包括呂美親（2009年）、李敏忠（2010年）等似乎仍蜻蜓點水，本文將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深入解讀。

跟隨的士兵緊緊依偎，而他從雲端看下去，那場豪雨只不過是幾小滴雨而已，於是他伸出舌頭幫大家擋雨，如同撐一把巨大的雨傘一般。以士兵的「我」第一人稱來觀看陳述，極其誇張地刻畫Pantagruel的超大尺寸，例如巨人打哈欠張開的嘴巴，鴿子飛進他的口中築巢。那裡生活的人還可靠種菜維生，挑菜到市場上賣，甚至還鬧過一場瘟疫，死了不少人，簡直就是某個真實國度的特寫。在「我」的觀看之下，巨人Pantagruel嘴巴裡隱藏的世界，竟然「一切都跟我們家鄉一模一樣」（tout comme chez nous）。[7] 哈伯雷的嘲諷書寫策略，就在這些荒誕面具底下，順著「一切都跟我們家鄉一模一樣」的隱喻，巧妙地調侃當年歐洲地方政治、宗教等醜怪現象。這種怪誕（grotesque）的文學風格，被學者巴赫金（Mikhaïl Bakhtine, 1895-1975）視為狂歡化的文學（lettérature carnivalisée）。平行在官方禁慾的、嚴肅的文化之外，仍然頑強地存在一種嘻笑的民間文化（culture populaire du rire），可以逃避官方論述、單一聲音且統一的意識型態。[8] 這種書寫策略相當靈活，不僅是多重聲音性（plurivocalité）、多重語言主義（plurilinguisme），讓許多不同聲音，不同觀點同時出現，更重要的是論述的陌生化。這種陌生是來自於一種反轉與扭曲變形，來自於外界的他者存在的反射：[9] 包括騙子（fripon）、小丑（bouffon）、傻瓜（sol）等典型的戲劇人物，而小說的誕生就是來自於這些民間文化的搖籃。作者彷彿戴上這些不同的面具，而自己本身的人稱也消失了。這些嬉鬧的小丑、傻瓜，可說是地獄、死亡的法律與神的變形。而封建時代的秩序與意識型態，則重新以偽君子、說謊者之姿粉墨登場。

文藝復興的文學基調之一，是本土語言的覺醒書寫。哈伯雷揉合了古代、中世紀、現代的語彙、法國各地的方言，以及各種行業的行話。同樣的，蔡秋桐小說的混雜性，不僅混雜了中國白話文、日式台語等語碼混合（code-

7 Auerbach, Erich. *Mimésis: La représtation de la réal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Paris: Gallimard, 1968〔1946〕）, pp.267-271.

8 Bakhtine, Mikhaïl. *Esthétique et théorie du roman*.（Paris: Gallimard, 1978）, pp.97-98.

9 同註8，pp.305-308.

mixing），主要以台灣話文書寫為主。[10] 例如將日語的「御歲暮」寫為台語諧音的「烏紗帽」。[11] 此外，〈帝君庄秘史〉常用的起始語「卻說」，確實有說書人或章回小說的味道。這可能要歸功於傳統漢文教育的影響。[12] 蔡秋桐是日治之後相當早期接受新式教育，而從公學校畢業的一批台灣人，但他是在16歲就讀公學校之前，在7、8歲時，就已經進入私塾讀漢文[13] 。值得注意的，當年的漢文雖然是教導閱讀漢字，卻是使用台語教學的[14] 。蔡秋桐的小說書寫雖然採用漢字，卻是一種台語發音來閱讀的創作。甚至日本人的姓氏，也被轉換為台語語音。例如〈王爺豬〉的「夫乳腳瓦部長」，可能是日語「藤川部長」的台語音譯。

其次，哈伯雷小說可能是來自民間文化、來自狂歡節慶的嬉鬧，使得他的小說呈現一種反轉與扭曲變形的論述。這種與主流權勢相抗衡的論述，可說是一種對抗既存論述的實踐而形成的論述，即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所說的對抗論述（counter-discourse）。他認為符號的多重音性（multi-accentuality）意味著沒有一種話語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在假設的抗爭、相反的論述上，與之相抗衡。[15] 蔡秋桐21歲的年少階段，就開始進入社會，擔任地

10 呂美親，〈論蔡秋桐的台灣話文小說——以〈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痴〉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8期（2009.04），頁9-36；李敏忠，〈混雜、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0期（2010.04），頁261-290。

11 蔡秋桐，〈保正伯〉，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二冊・一群失業的人），頁293。

12 李敏忠，〈混雜、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0期，頁278。

13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頁47。

14 台灣民間所說的「漢學仔」（hàn-oh-á），又稱「私學仔」（su-oh-á），較正式的稱呼為「書房 」（su-pâng），純屬延聘教師的私人教育機構。書房教育既無法與日治時代中等教育機構銜接得上，又不可能訓練學生預備科舉考試，因此書房主要的目的就在於培養學生讀書與識字的能力。比蔡秋桐晚九年出生的文學家張文環（1909-1978），曾在一篇自傳性文章〈茨の道は續く〉提到：他出生在山裡的部落，不像都市的小孩能有玩具或能看戲，而只能用在書房學習的漢文，看歌仔簿，或吟千家詩，慰藉自己的無聊。引自張文環著，陳千武譯，〈荊棘之道繼續者〉，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6）（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03），頁162-163。張文環童年的書房經驗被寫進小說〈論語與雞〉，意圖呈現小孩子羨慕下山到公學校念日文的心態，及民間漢文教育的衰敗。引自張文環著，鍾肇政譯，〈論語與雞〉，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八冊・閹雞）（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不過，這些漢學仔語文教育，卻讓他日後有能力自行閱讀《七俠五義》。引自張文環著，陳明台譯，〈關於臺灣話〉，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6），頁106-107。

15 Terdiman, Richard. *Discourse/ 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century France*.（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6.

方基層的保正、製糖會社原料委員。這些很早就進入台灣社會，他的日常生活又必須接觸形形色色的民眾，熟悉這些臺灣民眾的知識，應該是相當自然而然的本領。巴赫金檢討哈伯雷小說，發現作者似乎戴上了民間文化常見的騙子、小丑、傻瓜等誇張面具，使得小說充滿各種怪誕色彩。同樣的，從〈帝君庄秘史〉的出場人物看來幾乎是篇神魔小說，諸如「田螺王」、「石頭王」、「肥力爺」、「齊天大聖」、「豬八戒」、「沙僧」、「球毛進士」、「糶尿進士」、「色鬼議員」、「孔道議員」、「羅經議員」等。這些詞彙本身及其文化背景，毫無疑問地，應該是來自台灣民眾的知識。透過這些庶民文化的包裝，卻可能隱藏了一種反轉或扭曲變形的論述，一種平行於官方論述之外的觀點，如同這篇小說標題「秘史」的意涵。

秘史，是傳統戲曲裡常用的詞彙，例如刻畫狸貓換太子的《宋宮秘史》，或從呂四娘刺雍正，到少林寺反清復明的《清宮秘史》等。秘史，也就是在官方歷史之外的野史。如果說，官方書寫歷史檔案，是一種大寫的歷史，而民間耆老小寫的歷史，包括記憶、口述等在淪為鄉野奇譚的時代，如何能翻轉權力的位階，甚至邁向逆寫帝國的可能？2005年的台語小說家陳雷（吳景裕），是以「鄉史補記」的概念，來重寫故鄉土地上生活過有血有肉的這些人、那些人，既來自歷史又可不受歷史格局限制的小說。相對的，這篇1930年的中篇台語小說〈帝君庄秘史〉，可說是默默領導時代的先行者。

本文撰寫的動機，無非是一個唐吉訶德（Don Quijote）式的異想天開。這位架著長矛、古代皮盾的騎士，他如此冥頑不靈地相信古代書本裡陳述的真實性，於是他帶著一匹瘦馬、一隻獵狗，展開一場與荒謬怪誕文字妖怪的大作戰，一場探索最後真相的冒險旅程。為了解開謎團而開始踏上解讀〈帝君庄秘史〉的旅程，首先將面臨的沿路荊棘就是台語詞彙。想要解讀這篇台灣話語的小說，至少必須藉助日治時代小川尚義的《臺日大辭典》。其次，這個久藏在舊報紙塵埃的小說，很不容易解讀的部分原因，可能來自於他獨樹一格的書寫策略。作者戴上了濃妝豔抹的面具，來反諷、消遣他所熟悉的現實人物。這些陌生化、或偽裝背後真正的目的，恐怕是為了避免讓讀者難以一眼辨認出來。解開隱藏在面具底下的真實面貌，最直接方法就是仔細並廣泛地參照歷史文

獻，包括《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州祠廟名鑑》、《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府官報》、《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大正版）》、《臺灣地名研究》、《臺日大辭典》、《臺灣人士鑑》等史料，以作為理解時代脈絡的基礎。這將是我們理解這篇小說的一把鑰匙。但小說並非歷史的覆寫而已，它不僅可透過虛構的想像力來再現真實世界，也可藉著民俗語境輻射出的隱喻意涵，而形塑出一種獨特的論述。以下我們將思考小說文本如何藉助民俗詞彙假面的偽裝，來處理真實的歷史人物的書寫策略。如果能夠回到特定的歷史時空來重新閱讀，或許更能夠深刻感受到它如何再現當年地方政治光怪陸離的景象，或如何調侃戲弄地再現當時政治人物的種種醜態。

二、假面的虛與實

前行研究者值得肯定的是，[16]〈帝君庄秘史〉出現的地名「北江山」因台語發音的類似，而被指認出是「北港」。如此也可以瞭解小說的舞臺，是如何親近作者蔡秋桐所生活的鄉土。不過小說標題「帝君庄」所指涉的真實地點，可能尚待史料的舉證說明。其次是該小說文本特有的歷史時間的思辨。田螺王、石頭王被這篇早期的研究認為是大正天皇（1879-1926）、昭和天皇（1901-1989）。理由是田螺王的日語たにしおう，類似大正（たいしょう）。但是石頭王為什麼是影射昭和，卻欠缺進一步說明。如果將田螺王視為大正天皇，那麼這篇小說第十回提到的「十年後，田螺王御崩[17]，石頭王坐天」，似乎有違史實。大正天皇在位長達十五年，之後才是昭和繼任，那麼如何解釋「十年後」、「石頭王坐天」則是棘手的課題。

〈帝君庄秘史〉文本一開始，即明確指出一個的地名「媽祖郡帝君庄」，形容描述那是一個新興的農村。第二段描述「這個帝君庄的農產物最大宗的就是甘蔗，而其水稻、蕃薯、土豆次之」，而「嘉南大圳」造成該地農產豐

16 陳淑容，〈論蔡秋桐及其新文學運動〉，溫彩棠編，《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頁318-319。

17 御崩，是日文漢字，指天皇、皇后等去世的專用語。原文「崩御」，疑似印刷誤植。

收。第三段出現了田螺王，他下了聖旨一道「將各地號更新的更新，復舊的復舊」，「那個帝君庄，就是這時候，改換的新庄名。」整個段落所敘述的地理景觀如此鮮明而具體，而地名、人名顯然是透過假面的包裝與虛擬。

帝君，是台灣常見的民俗詞彙。雖然可能指關公、文昌、孚佑帝君等特定神明，但是放在蔡秋桐居住、活躍的北港一帶，則是指元長庄的保生大帝。例如《臺灣日日新報》夕刊，可查到1929年4月25日〈帝君祭典〉，[18] 指元長庄鰲峰宮帝君公祭。同年10月10日〈求安迎神〉，[19] 報導北港郡元長庄因瘟疫盛行，「該庄李哉、傅麻等，謀請鰲峰宮帝君繞境除疫。」1930年4月17日〈帝君過火[20]〉：「北港郡元長庄元長鰲峰宮保生大帝，於例年元宵，有繞境過火之例。」更明確地說，北港一帶的帝君，指的就是元長鰲峰宮。元長鰲峰宮的歷史很悠久，據《臺南州祠廟名鑑》可知此廟位於「元長庄元長四〇五」，創立於咸豐3年（1853），所供奉的主神為保生大帝，相傳隨著李姓先民自福建泉州南安而移駕至台灣[21]。

如果帝君庄是指元長庄，那麼媽祖讓人聯想到的是鄰近的北港。日治時代的臺南州，分為臺南市、嘉義市、新豐郡、新化郡、北門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北港郡等行政區域。北港郡，則包括北港街、元長庄、四湖庄、口湖庄、水林庄。[22] 依據以上當年的行政區域合理解讀，「媽祖郡帝君庄」應該就是「北港郡元長庄」。回到歷史現場對照，這也正好是蔡秋桐居住地：「臺南州　北港郡元長庄　五塊寮三四〇」。[23]

小說文本提及嘉惠當地農產豐收的嘉南大圳，即1920年代台灣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1886-1942）所設計興建的灌溉工程，正好穿過當年元長庄的東邊。參照1921-28年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繪製的《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圖2），不僅可看到北港郡元長庄，其管轄範圍包括客子厝、頂

18 臺灣師範大學教職員圖書查詢系統「《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來源：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
19 同註18。
20 同註18。
21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台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頁238。
22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台北：蕃語研究會發行，1938），頁360-374。
23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頁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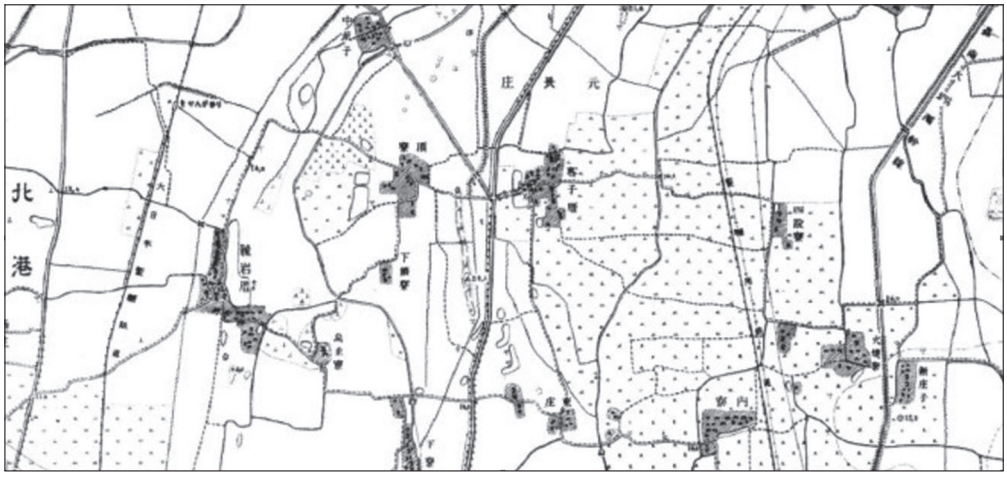

圖2　1921年《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數位典藏網「台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可查到北港郡元長庄，穿過郊區東側的「嘉南大圳濁幹線」。略西側的「大日本製糖鐵道」，則是小說後半部某些庄協議員被批評為「鐵道西」本位主義的那條鐵道。蔡秋桐擔任保正的「五塊寮」，則位於地圖之外的西邊。

寮、下寮、內寮、龍岩厝等，而且還可找到當年灌溉工程的「嘉南大圳濁幹線」，即引自濁水溪水的灌溉線路。還有相對於嘉南大圳穿過北港郡元長庄的東側，「大日本製糖鐵道」則是略位於西側，而將整個元長庄分為「鐵道西」與「鐵道東」。

至於「那個帝君庄，就是這時候，改換的新庄名」，應該是指1920年台灣實施的街庄制度。這項政治制度的改變，也使得台灣地名出現許多重大的變革。新制的「元長庄」，相當於舊制的「白沙墩堡」。據明治43年（1910）1月18日台灣總督府的《府報》第2873號顯示，北港支廳，包括大尖山堡、大槺榔東頂堡、蔦松堡、白沙墩堡。白沙墩堡，管轄範圍包括客仔厝庄、下蓁庄、頂蓁庄、內蓁庄、鹿蓁庄、子茂庄、元長庄、龍岩厝庄、合和庄、山仔內庄、後湖庄、五塊蓁庄、潭內庄[24]。對照1936年的〈市街庄大字名一覽〉，舊制原隸屬白沙墩堡底下的行政單位的「庄」，都改稱「大字[25]」，約相當於戰後的

2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官報資料庫」（來源：http://db2.lib.nccu.edu.tw/view/loginAction.php）。
25　同註22，頁371。

村里單位，全都歸新制的元長庄管轄。除了行政單位變更，地名也略做調整，舊制地名的「蓁」全數被改為「寮」，而「客仔厝」被改為「客子厝」，如同小說戲謔口吻所言「地號也換新名，制度也換新款，真真換到五花十色。」參見1921年的《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大正版）》（圖3），正好可以看到舊制行政區域「白沙墩堡」被打上紅叉記號，而新制的「北港郡元長庄」另以紅字標示。

「北江山」，因「北江」（pak-kang）其語音與北港（pak-káng）類似，影射的當然是北港，但更明確的說，是指「北港郡」底下的「北港街」。仔細釐清其地理範圍，將更能理解小說裡來自「北江山」的沙僧，為何後來會被「帝君庄」的人講閒話，原因就在於其影射的對象應是指北港街出身的知識分子。

其次，田螺王與石頭王的指涉應該一起考量。田螺王，應是指推動市街改正的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在他的任內（1919-1923），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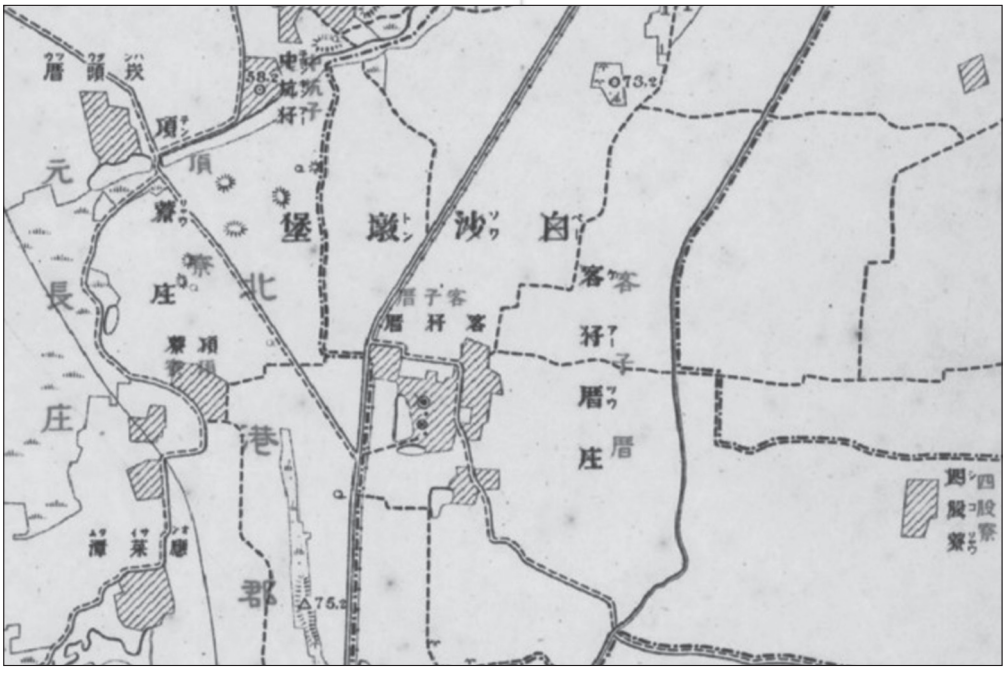

圖3　1921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大正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數位典藏網「台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正好可以看到舊制地名的「蓁」全數被改為「寮」，而「客仔厝」被改為「客子厝」。舊制的「白沙墩堡」被打上紅叉記號，還有另以紅字標示的新制地名「北港郡元長庄」。

動了影響深遠的台灣地方政治制度，還有台灣地名的改革。石頭王，應該是第13任台灣總督石塚英藏（1866-1942），雖然他們並非前後任的台灣總督。這篇小說第十回提到「十年後，田螺王駕崩，石頭王坐天」，指的是田健治郎總督推動市街改正（1920年）之後十年，於1930年去世，此時擔任台灣總督的是石塚英藏（石頭王）。石塚總督的任期1929年至1931年，多少也符合的小說書寫脈絡。

「田螺王」、「石頭王」，可說是充滿民俗風格的嘲諷隱喻。田螺，是昔日台灣農家巡田水，或清澈的灌溉溝渠，隨手可以撿拾的生物。田螺是有殼軟體動物，體積不大，約拇指大小，僅能作為農家平淡飲食的加菜佐料。因其體積細小，田螺常被用指微不足道之意。例如台灣民眾生活諺語「報田螺仔冤」，指某人為極小不足道的怨氣而伺機尋謀報復。相對於日本內地，台灣本島不也是一個面積不大，小小的「田螺」？從台灣總督姓氏的「田」、「石塚」，聯想到「田螺」、「石頭」，確實是很頑皮的文學想像，更何況戲謔地將他們稱為「王」。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總攬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權，不啻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台灣王」。若將「田總督」、「元長庄」置於括弧內重讀小說，更可感受到藉著民俗詞彙與想像來揶揄當權者的巧妙策略：

> 卻說田螺王（田總督）坐天以[26]來，正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途不拾遺，儼然像堯舜的天下一般。正因為這款好現象，田螺王（田總督）就出了一道的聖旨：「寡人坐天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劍[27]歸國庫、馬守南山，這是寡人鴻福。[28]將這款好現象，在寡人統治下的地號，一律更新，以誌不忘。」自這道聖旨一下，各大臣就日夜不休地研究舊歷史，將各地方的地號，更新的更新，復舊的復舊。地號也換新名，制度也換新款，真真換到五花十色。那個帝君庄（元長庄）就是這

26 原文「已」，疑似排版誤植。
27 原文「創」，疑似排版誤植。「劍歸國庫、馬守南山」，字面的意義即不需要刀劍，也不需要騎馬打仗，泛指不需使用武力征服的太平盛世。
28 原文「皇福」，語音與「鴻福」相同。

時候，改換的新庄名。[29]

高高在上的臺灣總督，突然好像變身台灣民眾熟悉的野臺戲的演員，以濃妝豔抹的帝王姿態出場。「寡人坐天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原本是扮演皇帝的演員的固定專用套語，竟然出自台灣總督之口，格外具有戲弄調侃的意涵。

怪誕風格的文學，雖然一開始似乎有其想要諷刺的對象，但更重要的是虛構的想像力不會僅停留在淺白的諷刺而已，而是更進一步延續這種荒腔走板的裝扮繼續演。當小說文本發展到豬八戒擔任帝君庄庄長引起反彈，田螺王卻又因不信任齊天大聖，而猶豫不決地走入後宮。在宮女伺候的溫柔鄉，田螺王與正宮娘娘商量後，終於才決議啟用沙僧擔任庄長：

> 坐在田螺王的腳腿上的正宮娘娘，不只[30]驚疑，就啟口：「君王啊，因何不爽快？是病乎？我聞北江山的媽祖婆甚然靈驗，來去北江山行香，也可看看景致如何？」這時田螺王忽然大笑一聲曰：「有了！有了！」時，正宮娘娘又驚又喜，真莫名其妙。天仙似的宮娥進了茶，來食罷。那憂鬱的田螺王，一變而春風滿面對娘娘曰：「寡人忘記了北江山矣。這個帝君庄啊！真真難治的帝君庄！……正想不得其人，聞愛卿講那北江山，即記得沙僧。我想那派沙僧如何？」正宮娘娘聽了，講：「沒有妥當！沒有妥當！沙僧雖然性溫和，不拘在往西天路上，被那齊天、豬哥[31]精很輕視。甲那沒有常識的去，也難得支持呢！」田螺王聽了，道：「若如此，如之奈何呢？！」「在我的愚見，帝君庄民性極野蠻，不如採用移入庄長。」正宮娘娘講了。田螺王又曰：「愛卿所奏，和諸卿所奏同款。如果採用移入的雖好，卻有無視土著民了。我想，暫時派他去看看。倘若勢面不好者，該移入即來移入如何？」「妙哉！妙

29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一）〉，《新高新報》249期，1930.12.04。
30 這可能是蔡秋桐當年的書寫習慣用字。參照《臺日大辭典》，應該可寫「不止」。
31 原文「羔」。

哉！」正宮娘娘講罷。隨時出了聖旨，敕他去那帝君庄做庄長了！[32]

田螺王與正宮娘娘談話的場合，就是傳統戲曲舞臺上的後宮。這種後宮的政治，無非是一種密室政治的寫照：國王夫妻之間的閒談，竟然是地方政治人事任用的重要決策場所。在缺乏選舉民意決定的時代，台灣地方政治首長的派任，如同小說的異想世界，他們的走馬上任不啻也是一齣荒腔走板的野台戲？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敢如此直接以戲謔的口吻來諷刺台灣總督的恐怕並不多見。蔡秋桐，可說是相當具有勇氣的一位。

三、戲弄地方政治人物

〈帝君庄秘史〉既然有其明確的歷史、地理的座標：從第一回開始的1920年，至第十回的1930年，前後總共長達十年。故事展演的舞台，環繞著北港郡元長庄。因此如果要解開戲謔怪誕面具底下的謎團，當然必須要深入當年的地方政治生態及實際的政治人物，包括曾任郡守的日本人，還有擔任庄長的台灣人、日本人等。

首先出場擔任「帝君庄庄長」，是「豬八戒」。他坐在庄長位置，僅「二百五十二日」。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知[33]：陳金木在大正九年（1920）12月擔任元長庄庄長，但是隔年（1921）已調任為「臨時國勢調查部調查課雇員」。陳金木可說是一位相當短暫的庄長，確實也與豬八戒擔任庄長短短「二百五十二日」的情況類似。若說陳金木是小說文本粉墨登場的豬八戒，那麼繼任的沙僧，應該就是從1921年至1924年擔任元長庄庄長的蔡煥階。而此後繼任庄長的「肥力爺」，可能是指1927至1937年擔任元長庄庄長的芳賀來五郎。肥力爺，是這篇小說後半段的重量級人物，從第三回提到他「現實失業，過那洋洋大海而來，沒有職業是不可」開始，一直貫穿到小說的結尾。在〈帝君庄秘史〉發表的1930年，芳賀來五郎還正在擔任元長庄庄長。無論如何，這個略嫌怪異的詞彙，應該不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人的庄長。肥力

32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二）〉，《新高新報》251期，1930.12.08。

3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爺，應該是《臺日大辭典》可查到的肥勒爺（pûi-lek-iâ），[34] 即佛教的彌勒佛（Maitreya）。台灣民間的彌勒佛的最典型形象，就是外表心寬體胖、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模樣。因此這個詞彙，很可能被用來嘲笑某人的身材肥胖。如果可以找到元長庄第三任庄長芳賀來五郎的照片，應可直接證實其長相外貌是否如此，可惜目前還找不到。至於「媽祖郡長」，應該是1925年至1929年在臺南州北港郡役所擔任地方理事官，也就是「郡守」一職的藤黑總左衛門。[35]

以拐彎抹角的方式，來描繪自己住家附近的政治人物，不失為一種安全且自由的書寫策略。這種想像的自由，因而也容許小說以漫畫的筆調來調侃這些地方政治人物，尤其是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如何爬升到庄長的位置，更是可以被納入戲弄，甚至反省批判的對象。如同小說第一回描寫的：

> 卻說豬八戒，自西天回來自誇：「我已經受了戒律[36]。在這舊換新的時候，不出來待何時呢？帝君庄內雖有齊天大聖，不過[37]，近來大聖自西天回來，得意洋洋，儼然像百外萬似的，必然尚未出來運動。人講，先下手為強！」就想卜去運動，這個帝君庄庄長的椅子來坐坐看呢。一去，果然田螺王，念他往西天的時，千辛萬苦，經也取回來了，又比別的有較精光，也就敕他來做帝君庄庄長了。[38]

「豬八戒」強調他自己是「西天回來」、「受了戒」、「取經回來」，如同戰後所說的「喝過洋墨水」或「流過洋」，而對日治時代的台灣人而言，則可能是指接受國語（日語）教育。「取經」作為一種巧妙隱喻。唐三藏藉著印度梵語的習得，最後將重要的梵文經典請回本國的過程，不也與當年台灣人遠赴外地學習日語，並將日語典籍請回村莊頗類似？當年在北港元長一帶具備日

34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下）（台北：臺灣總督府，1932.03），頁729。

35 藤黑總左衛門，在1913年阿緱廳阿緱公學校擔任教諭，1917年到嘉義廳庶務課，1920年12月到臺南州內務部教育課擔任視學，1922年嘉義郡役所庶務課。較特別的是，他在1919年擔任「公立實業學校公立嘉義農林學校 教諭」，應該就是這所學校草創的年代。這所學校，就是後來以棒球聞名的嘉農（Kano）。

36 原文「略」，疑似誤植。

37 原文「夠」，疑似誤植。

38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一）〉，《新高新報》249期，1930.12.04。

語能力，而且因而取得一官半職的台灣人可能態度頗驕傲且浮誇。小說文本以略帶諷刺地描繪豬八戒剛上任庄長的傲慢氣焰，凸顯了他的高人一等，特別是與一般台灣人的差異性，甚至要求所有的公文書都必須經他批改才可：

> 豬八戒坐軟交椅了後就想：「我這隻豬哥精，那無展我這支豬哥生出來，給大家看看長短，無彩我坐這塊軟交椅！」第一先起手，就對那豬稠內的諸兄弟，展威道：「眾兄弟啊！我是個庄長呵，你們是我的部下。以[39]後，不得對我亂來；要禮禮貌貌，即會用得。我也有去過西天受戒。你們無過是跟那舊式的教育而已。就是有受些新的教育，不過學幾句圭母屎式的，萬萬不及我受了千辛萬苦學來的。西天去的路途不但遙遠，而[40]是崎嶇無比呢！單單念那幾句子曰，現時是不達半文錢了，汝知道嗎？凡有要發送的文書，全部要提來我刪改，即可發送，即不會去出醜。這幾句，愛緊記在心。」[41]

身為台灣人，卻有意要凸顯他自己與一般台灣人的差異，其目的無非要藉此贏得尊敬崇拜，讓自己擔任庄長的職務更具合理性。「豬八戒」很驕傲地誇耀辛辛苦苦所受的新式教育，不同於一般台灣民眾只會幾句簡單的日語會話。有趣的是「圭母屎」，可能是台灣人在學習日語的經驗，一旦遇到禮貌的日語語氣，總是要加上「ください」，例如一般鼓勵別人的話語がんばって，更禮貌的說法則是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這些禮貌結尾的語氣詞「さい」聽在台灣人耳朵裡，卻好像都跟「屎」一樣。圭母屎（ke-bó-sái），或可理解為「雞母屎」。原本殖民者高尚的禮貌語言，卻因為這些語音／語意聯想而被貶低化。而接受舊式私塾教育出身，只背誦古書的人，則被批評得一文不值：「單單念那幾句子曰，現時是不達半文錢了，汝知道嗎？」這種傲慢，被幽默的書寫風格消遣為「展豬哥生」。生（lān），即台語的陽具。這種炫耀詞彙不僅用來合理化自己庄長的職位，恐怕也與該庄長的私德有關：

---

39 原文「已」，疑似排版誤植。
40 原文「人」，疑似排版誤植。
41 同註38。

> 而那隻豬哥精，自齊天返來，展他的豬哥[42]生，世上的婦女被他污去，不知幾萬千數。因他有功於田螺王，後山太崎，所以受污的人敢怒而不敢言。其實這豬哥精在帝君庄裡，名譽也是真歹[43]呢。[44]

「豬八戒」所影射的這位首任的元長庄庄長，可能在當地很不得人緣。可惜從官方史料檔案裡，無法瞭解陳金木庄長短暫任期的原因。但這恐怕也是臺灣民間人士試圖以野史或秘史，來書寫自己鄉土政治人物的動機之一。

「豬八戒」最後失去庄長職位，是與「齊天大聖」有關。如果從《西遊記》來理解，齊天大聖是比起豬八戒能力更強的人物，但是有時卻不得不屈就現實。「齊天大聖」似乎是指某些不服氣首任庄長，卻自認為很有能力的台灣人。他們是同樣也讀過日文的台灣人，「圭母屎也會放」，甚至衣著都已經完全模仿日本人，卻沒想到庄長卻沒有自己的份，難免心生嫉妒：

> 卻說齊天大聖，聽見豬哥精升官，就升起了嫉妒之心，曰：「我雖然沒有念幾年新文學，也有去近那腳牛腳得道和尚，讀了幾多夜的夜學。圭母屎也會放。在這得道和尚，看我真有上目，常常對我講：『我有這個帝君庄的才。』我也自信自安，就是官場，我也會跑。衣服也改用那，無異一個大和民族。豈料官報發表了，竟然落選呢！」這隻猿仔得了信了後，腳踏不帶地，今日跑去求得道和尚幫忙，明日跑去白精洞，求拜白精，看有什麼魔術，可從這隻豬哥精趕出境外？……而那個得道和尚之下，有徒弟二、三百人，朝夕在讀經時候，每每反對這隻豬哥精，講些豬哥精的劣點，稱讚猿仔的美處。致而這二、三百徒弟，也總和師傅，揭了反豬哥的旗了！[45]

造成豬八戒最後失去庄長寶座，最重要的反對勢力可能是來自夜學的台灣

---

42 原文「高」，疑似誤植。
43 原文「呆」。
44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二）〉，《新高新報》251期，1930.12.08。
45 同註44。

學生，「二、三百徒弟，也總和師傅，揭了反豬哥的旗了」。夜學會，是元長青年研究會辦的附屬單位，蔡秋桐、北港郡藤黑郡守等人都與會致詞。從1928年6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的「開夜學會」，可以管窺當年元長庄的地方政治生態：

> 元長青年研究會，附屬夜學會發表式，於去二十日下午一時開會。來賓則藤黑北港郡守，及該地有志等臨席。頃刻，由蔡秋桐氏述開會辭，李總務委員，及高岡校長講話，次藤黑郡守，以下來賓祝辭，於三時閉會云。[46]

元長青年研究會辦的夜學，出現了「高岡校長」。「高岡」的日語發音たかおか，前後出現兩次か的發音，剛好跟台灣話的腳（kha）很類似。「那腳牛腳得道和尚」，指的應該當年的「高岡校長」。那麼親進這位高岡校長的「齊天大聖」，可能是元長青年研究會裡某位有抱負，卻無法在地方政治一展長才的人。雖然無法確定其真實身分，但是他最後卻能發揮實質的政治影響力，而讓豬八戒最後失去庄長職務。當「豬八戒」失去庄長時，小說還以調侃的筆調，來刻畫他當年以數千圓去說情，汲汲營營牟取政治官位的嘴臉：

> 四面楚歌的豬哥精，果然僅僅做了二百五十二日，也就不得不從這塊軟交椅，給他人去坐了。可憐啊！大大可憐！提數千圓去運動，即得著這塊椅仔位而已，連這位也保不得。真真猿也沒有，某也沒有了！[47]

第二任的帝君庄庄長是沙僧。沙僧的西天取經，可能影射當年蔡煥階離開故鄉元長，而遠赴台北就讀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即今日臺北教育大學）的求學歷程。這所學校是日治時期的官方教育機構，其創校宗旨就在於培養台灣人教師，充任公學校教職。從校友名單可以看到，蔡煥階在1902年畢業於「國

46 臺灣師範大學教職員圖書查詢系統「《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來源：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

47 同註44。

語科[48]」、1914年畢業於「公學校訓導臨時講習科[49]」。台灣人能夠通過這所學校的訓練，在當年應該都是極少數的菁英。沙僧自西天回來之後的第一件工作的「救世傳道」，參照《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能是指蔡煥階在1913-1917年擔任嘉義廳北港公學校的訓導。他在擔任公學校的訓導，可能脾氣不是太好，而有體罰學生的傳聞：「有時，徒弟不聽他教示，就發那他的性根，打打徒弟了。」小說文本將這麼一位台灣人，遠赴台北求學而獲官方認可的學位之後返鄉任教，而後突然被任命為庄長，整個相當戲劇化的過程被刻畫如下：

> 卻說沙僧自西天回來，他就去救世傳道，展展他由西天學來的道理了。沙僧雖然性極靜，在往西天路上，不時跟隨三藏，為三藏牽馬。得了三藏的教訓，和尚也有些野蠻性。有時，徒弟不聽他教示，就發那他的性根，打打徒弟了。和尚像這樣粗暴，道就不行了。沙僧至此，也想我既不行，道就不去傳。就跑去北江山，做了北江山大士。自得了大士的稱號，日日得意悠悠以往。晚年了！有一日，大清早起來，在後花園玩賞，遙聞鑼鼓聲響，傾耳而聽之，那鳴那近了。「啊！聖旨到嗎？開門迎接！」沙僧見了。「聖旨跪下！聖旨！寡人念汝自來北江山，想沒有甚麼可給汝的官職。現時，帝君庄庄長欠員，命汝去就職。」使者讀罷。沙僧領旨了後，一喜一懼。喜者，做大士地盤要闊[50]；那做了帝君庄長，就該庄的事件皆歸我。懼者，該庄齊天大聖和豬八戒，那反對卜如之奈何？」[51]

當年的蔡煥階由公學校的訓導，突然搖身一變而擔任庄長，其過程應該是很戲劇化。這種由上而下欽點任庄長的過程，不也與沙僧突然接獲聖旨的帝王將相的傳統戲劇如出一轍？小說文本以在地人貼近的觀察，稱讚他擔任元長庄庄長的階段是最圓滿的時期。但蔡煥階似乎將心思都放在北江山（北

48 台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歷屆校友名單」（來源：http://r8.ntue.edu.tw/pastalu/01.htm）。
49 同註48。
50 原文字跡模糊，疑似「闊」。
51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三）〉，《新高新報》253期，1931.01.08。

港），「一禮拜來這帝君庄，沒有一次。住民感覺有種種不便，信用也沒有甚麼好」，因而最後引起民怨：

> 沙僧坐了這任的中間，可說是帝君庄，施新政以來最圓滿的時期，也可以說，帝君庄的紛亂，是個沙僧來收拾的了。雖然是這樣功勞者，卻庄民不甚[52]歡迎。就是他一心，北江山大士事業，而不顧當庄政治。一禮拜來這帝君庄，沒有一次。住民感覺有種種不便，信用也沒有甚麼好。就是田螺王，也都認定不可重任，即昇那肥力爺來繼續斯職了。自從肥力爺來坐這塊軟交椅了後，帝君庄就被弄得很好看，真是無奇不有了。布景也好，配役也好，後場的音樂隊也好，帝君庄的大出把戲，從茲開始。[53]

此外，繼任庄長位置的是肥力爺（芳賀來五郎）。這位來自地方的政治人物，卻是以略帶奇幻的筆調來勾勒其身影：

> 說這個肥力爺，是由東方王國逃來的。因東方王國，自維新以後，人民智識大開，文化程度很向上。在那個國內，差不多沒有人可燒香點火，日不得三餐，餓到卜白目去。人講，極即變。他也就不得不棄了慈愛的故鄉了，慎慎[54]行了。沿路行、沿路討食，不知道行了好幾日，即到了一個新開的國家。這個國家土著民，皆守那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的信條。又這個國王，也是施那愚民政策的，極合肥力爺的頭槌。至此就止了步，等等頭路了。有一日肥力爺，遇了一位朋友，欣喜得很地講那他的來意，欲懇求他覓頭路。那個朋友想好久，道：「自此，再去不遠，有所在叫做無港。那地方無數荒蕪，地曠人稀，住民也很愚蠢，見烏也拜，見白也拜。汝那沒有嫌風吹沙，去蹛看看，必定有出頭的日子！」餓鬼似的肥力爺，聽見這句話是很欣喜的，

52 原文「慎」（sīn）。
53 同註51。
54 指人進入恍神的態度。

> 那有驚甚麼風吹沙呢？就三步做二步走，去領一頂紅紋的帽來戴，和一枝光閃閃的長刀來結。……奈因那肥力爺，是個豆菜底[55]，至此危矣。雖帽子的紋，那換那好看，長刀那結那長，行路也那有派頭，也不得不提那美麗可愛的帽子，和光閃閃的長刀去返還了。皆再，這肥力爺和田螺王，是同族的，所以看見了他失業，就封他來這好孔的帝君庄，做助役，就是現任的庄長啦！[56]

肥力爺雖然後來擔任元長庄庄長，但是他卻被刻意消遣為窮極潦倒，不得以必須離開自己的故鄉（以「維新」、「東方」來影射的日本本土），而沿路乞討到一個接納他的國家（台灣）。筆觸一轉，順便以該國的國王施行愚民政策，來諷刺台灣總督的政策。從《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知：芳賀來五郎在1927年擔任元長庄長之前，正式的頭銜僅1920年12月嘉義郡役所警察課擔任警部補。肥力爺「一頂紅紋的帽」還有配戴長刀的職業形象，可能是指芳賀來五郎任職過的警部補。無論如何，芳賀來五郎在擔任庄長之前，都不曾擁有什麼顯赫經歷，即使嘉義郡役所警察課擔任警部補，似乎也僅維持約一年左右。芳賀來五郎履歷出現了五年的空白，是否相當於肥力爺的失業狀態？至於他為何會失業，小說僅輕描淡寫說他「豆菜底」而已。這個隱喻詞彙，應該是來自台灣菜辦桌習慣，在正式的料理之下，常以豆菜芽墊底。那些生的豆菜芽並不能食用，目的無非是讓料理擺起來好看而已。「豆菜底」，似乎影射芳賀來五郎是突然成功致富的暴發戶，如同以用豆菜墊底充場面，而缺乏真材實料。肥力爺最後在「無港」一地落腳，如果對應芳賀來五郎經歷的嘉義郡查詢，「無港」可能是指的是早已經沒有港的「新港」。舊制的地名「新港」，到了1920年代被改為新制的「嘉義郡新巷庄」。「港」改為「巷」，不也暗合小說文本「無港」一詞所指？肥力爺做過的豐功偉業，包括順應當地保正的提議，來修建媽祖廟而贏得民心，還有就是造過保安林。而修建媽祖廟，可能是指1917年

55 這個詞彙指涉的意涵可能有時代的差異。《臺日大辭典》指稱突然成功的暴發戶，或指用金錢來買學位的人。而戰後的台灣，則常被用來指特種行業的女性。

56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四）〉，《新高新報》254期，1931.01.15。

新港奉天宮的重建工程[57]？

從《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查詢的史料顯示，在蔡煥階1924年卸任之後，直到芳賀來五郎繼任庄長的1927年，似乎意味著1925-1926年兩年之間，元長庄沒有正式的庄長。這種政治空窗期確實讓人困惑，而小說描寫肥力爺遞補庄長的筆法措辭雖有點自相矛盾，卻也透露出一絲線索：「做助役，就是現任的庄長」。日治時代的基層行政吏員「助役」是協助庄長處理事務，職責完全不同於「庄長」。而真實的芳賀來五郎，確實曾當過元長庄助役，如《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6月23日）〈庄長更迭〉所提及的：

> 北港郡元長庄長蔡煥階氏，在職四年，日前任滿勇退，以該庄助役芳賀來五郎氏，襲其後任。氏原為臺南州警部補，曾於嘉義郡及水上庄各地勤務，大正十二年退官，就任該職云。[58]

芳賀來五郎，可能是一個有點爭議性的庄長。庄長辦公的所在地雖然是元長庄，但他卻仍居住在北港街宿舍，一個月僅到元長庄出勤數回。這些對庄政冷淡的負面新聞，在《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5月29日可以看到：

> 北港郡元長庄數年來助役缺席，而芳賀來五郎宿舍住北港街，月只出勤數 ，一般庄民有何要件證明，甚然不便。……庄民希望當局，置名譽職庄長，曾連署對州當局提出陳情，然現庄長任期在六月十日。聞有再任之說，是以同庄協議員，各嘆庄長對庄政冷淡，若果繼續連任時，則欲辭退，以免將來被庄民惡評云。[59]

表面看來〈帝君庄秘史〉好像一場廟口大戲，實際上卻影射了當年的地方政治人物。從傳統戲曲或章回小說借來的「齊天大聖」、「豬八戒」、「沙僧」等詞彙，被用來影射日治時代學過日語的台灣人。而「田螺王」及其相關

57 不著撰人，〈奉天宮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3，6版。
58 臺灣師範大學教職員圖書查詢系統「《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來源：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
59 同註58。

傳統戲曲的套語，則被用來諷刺台灣總督，以及台灣人身處缺乏以直接選舉制度，來參與地方首長的人事任命過程。形容肥胖外貌的台語詞彙「肥力爺」，可能都被用來影射當年的日本人庄長。這類藉著身體特徵來刻畫的人物，當年可能是活靈活現，但時過境遷卻也很難辨認。例如「球毛進士」，僅能猜測當事人可能頭髮捲毛的特徵。「秃尿進士」，可能是拿人名諧音開玩笑，如同蔡秋桐另一篇小說〈理想鄉〉的名字「蔡尿龜[60]」。而小說後半段重頭戲「古董會」的議員名字，更是充滿影射的色彩，例如「色鬼議員」，可能指當時某個好色的地方人物；「孔道議員」是篤信古書儒家教誨的人士；「羅經議員」，則是諷刺某些迷信風水，崇尚「羅經」（羅盤）能帶來好運的政治人物。在這些怪誕假面底下，卻可以相當自由地刻畫地方政治，即使是荒腔走板的亂象。

四、擺古董的庄協議會

〈帝君庄秘史〉的主題，在於揭露1920年推行的街庄制弊病。如果說小說前半部的主題是關於前後幾任庄長的任命或去職的不合理過程，那麼後半部的主題，則是針對庄協議會，如「古董會」隱含的意涵，僅充當中看不中用的擺飾。

官場的現形，當權者煩惱的可能就是如何掌握權勢，如何藉著權藉勢打擊異己。肥力爺得意洋洋當庄長之後，卻也因此煩惱：

> 汝不看，豬哥精做外久？沙僧做外久？那像如此，我也是一任，較妥當啊！夫人啊！這個帝君庄，我很愛他！我是放不得了他的啊！汝想想看呢，我們在這裡做生意，厝稅也替我們出，行沒有三腳步，也有出張[61]費可領。今日有這幾文錢，豈不是由那帝君庄得來嗎？[62]

第三任的庄長是很在乎自己權勢地位的人物，他擔心自己無法如前幾任庄

60 蔡秋桐，〈理想鄉〉，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二冊 ・一群失業的人），頁344。

61 日語漢字，指出差。

62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五）〉，《新高新報》255期，1931.01.22。

長那樣，做不了多久就下台。因為他捨不得因為庄長特殊待遇，可以免繳營業稅（厝稅），又可以領出差費（出張費）。他的太太正好忙著以餅乾來哄小孩不哭：「不要哭！汝母餅給汝罷！」這種光景給肥力爺一個異想天開的靈感，於是他大張旗鼓地發放廣告號稱說：「當庄的勢力家，有子弟侄，要入來帝君庄辦事者，就是學問沒有甚麼好的，也卜採用。」如此募集的活動，當然是藉著籠絡了當地的權貴頭人，以鞏固他自己身為外來者卻實質掌握庄長權力的位置。而對他具有挑戰威脅可能的齊天大聖，也在「古董會」奇特巧妙的任免機制底下，完全失去力量：

> 不過三五日，果然應募者殺到了。今日採用盲議員的子，明日採用龜議員的兒，真真採用到全庄役場的椅子位，專專是議員的兒子佔[63]去。肥力爺用這個方法，果然好勢一任過了一任，都沒有人反對了。
>
> 卻說齊天大聖，做不得庄長，也給他一個古董會的議員。田螺王將這假面具的議會，講是要監視庄長的機關。雖是有變的大聖，卻也沒有智識，被他騙去了。到那古董會的日，大鬧天庭、大鬧地府的大聖，信以為真，也大鬧不休，鬧到不成樣子，險險流會去。其實，這古董會，哪有勢力呢？（議員的任免，皆在庄長之手）大聖鬧古董會不成，也就不干帝君庄事，欲走入洞內靜養了。肥力爺應這機會，果然免他議員，而給心腹的了。[64]

古董會（庄協議會），雖是田螺王（田總督）號稱「監視庄長的機關」，但實際的運作方式卻很矛盾，議員組成的任命權力來源卻是來自庄長。庄協議會的功能，顯然無法與成熟的民主議會制度底下的質詢、預算審查、立法等功能相提並論。從正面來看，庄協議會具有凝聚地方的功能。如學者研究指出的，日本時代台灣社會，在傳統的血緣化、原鄉化之外，如何建構出維繫人群關係的「地域社會」，最主要的就是「街庄民空間」、「警察官空間」、「部

63 原文「占」（chiam），常用在占卜。引文指佔領、霸佔之意，疑似「佔」（chiàm）排版之誤。
64 同註62。

落民空間」這三層的結構。街庄民空間，指的是1920年實施的街庄制，庄民在明確的庄域空間範圍內，透過庄役場、庄協議會、信用組合、方面委員、共榮會等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交互網絡而結合為一體。[65]

齊天大聖的下場，正好是以在地觀點凸顯當年地方庄協議會的弊端。諸如齊天大聖這類具備大鬧天宮身手，但卻不是乖乖牌的地方政治人物，當然無法被直接任命為庄長，而改授以庄協議員之職，如同以餅乾來安撫哭鬧的小孩般。但是一旦他在庄協議會敢鳴敢放，將自己異議性格展露無遺時，反而順勢被庄長免去議員職位。而重新被官派庄長任命的庄協議員，都是庄長的心腹。因此這些庄協議會，無非是相當於擺著好看，而毫無實際作用的「古董」。小說文本戲謔的「古董會」或「假面具的議會」，間接地反映了日治年代台灣知識青年風起雲湧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強烈抨擊的議題。當年的台灣民眾黨（1927-1931）、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1937）等政治團體，都曾經向台灣總督府及日本國會進行請願。他們要求比照日本國內的地方自治，改官派為民選，將形式上的毫無實權的諮詢機關，改為真正能夠審查預算，監督行政、質詢官員的議決機關。這些民主覺醒運動，後來終於獲得台灣總督府的正面回應，而在1935年施行台灣第一屆街庄議會員的選舉，這也是台灣第一次民主選舉經驗。

從史料的檔案，可能很難瞭解當年的官派庄協議會究竟如何開議。而〈帝君庄秘史〉第六回至第十回，卻鉅細靡遺地刻畫當年這位家住北港街的庄長，他參與會議的細節（包括事前向上級畢恭畢敬報告，到開會時遲到），乃至會議過程當中，包括「色鬼議員」、「孔道議員」、「羅經議員」等荒腔走板的開議言論。

肥力爺，是長袖善舞的庄長。他在開會前一天下午三時左右，立刻向北港郡長畢恭畢敬地報備：「我因要去整理式場關係，想在後幫的自動車，就卜先來去。總是明日的大位，特請要請大人來去坐。本我是預定明日即隨大人來去。大人所知道，不早去看看，恐式場整頓不周至。所以本日就要啟程。請大

65 施添福，〈日治時代台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卷1期（2001.10），頁1-39。

人莫怪。」這位眼中只有權勢的庄長，在禮貌周到巴結上司的同時，卻很瞧不起嘴嚼檳榔、赤腳的庄民。當他離開郡長辦公室時，已經趕不上準時啟程開往元長的公共汽車。同車好心的庄民，通知公車司機停下來，等這位氣喘吁吁的庄長。不料庄長上了車，卻嫌棄他們可能會弄髒他的高級紳士禮服：

> 看見手錶已經四點了。咳！自動車[66]的時間到了。「倘去赴不及那免錢的自動車，就……。」開步大走了。走不慣的肥力爺，那堪得走了呢？走到停車場，已「株！株！株！」，車發去了。幸得車內滿載，皆是帝君庄客，即叫運轉手停車。追到上車，已經大氣直吹了。肥力爺上車，就向那赤足乘客曰：「你們須去坐旁[67]邊，口裡亂亂雜，不知道雜甚麼？檳榔汁亂亂注，我穿一領モーニング[68]那染著，卜安怎？」無彩好情好意，通知運轉手，叫運轉手停車，真真有功無賞。那赤足食檳榔的，皆暗暗地腹諫。[69]

如此可笑誇大的筆調，卻也如實地交代了當年這種庄協議會的相關細節，包括開會時間「依例定正月十一日」，庄長開會搭車不用自己出錢，出席的議員總共六名，每名議員「有二圓的旅費可領」，會議的進行從九點半開始（預定九點開始），中午僅短暫休息，直到午後八時三十五分才結束開會，還有會後晚宴則選在保甲會館。這些彷如置身會場的細節，似乎具備某些真實性。開會當天出席的議員穿著各具特色，而這時郡長、庄長卻遲到了。這種荒唐場景的時代背景，正好是日治初期透過時間觀念的引入，要求民眾與官員日常生活作息規律化，而對時間格外敏感的緊張，還有洋服、台灣服雜陳，甚至坦露胸膛、嚼檳榔等有趣畫面，刻畫得入木三分：

> 肥力爺因為明日開古董會心切，一夜睡不成眠。啊！討厭！無情的時鐘

66 日語漢字，一般指汽車。在此指公共汽車。
67 原文字跡不清。
68 日文外來語，指紳士禮服，原文可能來自morning。按morning suit、morning coats或morning dress，都是指參加婚宴的男禮服。
69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六）〉，《新高新報》259期，1931.02.20。

在壁上「知！毒！毒！」一更推過一更。

心思亂了，頭暈了。目閃[70]失，忽然聽見五下鐘聲，就起來了。今早各吏員也特別早來，差不多七點半鐘都已經式場安置好勢。古董議員，也陸續來了。因為有二圓旅費可領，無一人缺席，都總有一個古董款。也有人穿洋服，也有穿半洋服，也有臺灣服。最特色就是水蛙精古董議員，穿現胸、食檳榔。

開會時間是午前九點。至八點五十五分，早食慣的古董議員，也腹內的大腸，差不多要告小腸的樣子。九點到了，為[71]何郡長未到？眾人議論著。「做官人必沒有失誤。我常常聽大人講『時間著勵行』，有過，也是三幾分鐘」水蛙精議員講。[72]

「時間著勵行」，正好反映了日治時代特別強調的守時觀念。1921年台灣總督府為了加強時間觀念，養成守時習慣，規定每年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此後不斷地透過學校、社團、工廠、交通工具等設施宣傳時間的重要性，甚至舉辦演講、遊行或音樂會，張貼海報，散發宣傳單等，強烈鼓吹民眾培養準時、守時、惜時的精神。[73]經過十年的宣傳，這種準時的要求似乎開始深入人心，不僅參與開會的庄協議員如此自我要求，甚至連當年的讀者可能都已認同準時的美德。這種準時的精神，就在於規律化生活作息的實踐，從官僚的準時上下班，準時完成任務，到製糖會社的雇員，準時上工點名的規律。[74]理論上，生活一切的作息都按照時間來進行，但諷刺的是，所有與會的台灣人已經乖乖地出席等待，但是主持庄協議會的日本人庄長卻遲到了，因而會議整整拖延了半個小時才正式開始。

70 原文「相」。

71 原文沒有「為」一字，疑似漏字。

72 同註69。

73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03），頁64-66。

74 日治時代製糖會社的水螺聲響，在破曉時分提醒農村民眾起床，開始梳洗、早餐，趕赴工作場所，以等待監督點工。蔡秋桐在1936年的小說〈四兩仔土〉，很生動地描寫這種慌張工廠的生活步調：「土哥急急如律令地吃了幾多碗，放下碗箸也跑了，已跑得不見人影了。大家跑到昨日做未完工的蔗園來，土哥也追到了。眾人越頭看見土哥追到，叫聲說：『你若再慢一點，就沒有工可做了。』」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二冊・一群失業的人），頁356。

這些穿著繽紛的議員，開會發言也五花十色。水蛙精議員藉著批評近來的年輕人，讀幾年書，就開口閉口「自由平等，真真沒有天、沒有地」，反向地來襯托自己出人頭地的成功之途：「未出身，我甘願去做人的奴才，煎茶、掃地，而漸漸得了主人之愛。這時候，我也常常替主人去辦事，而結交朋友咯。朋友多了，賺錢有了。前那有官廳看我，就有著，百姓也尊敬了。」孔道議員，則是鼓吹「國家那卜振興，必著復興漢學」，接著將四書的《大學》篇章背誦一番，然後強烈抨擊最近的教育現象：「男不成男，女不成女呢！甚麼查某人也剪髮？也不串耳[75]，天強強要秉做地去。甚麼男女平等、社會公開？」如此口沫橫飛，開會到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才宣告休憩。而午餐，也僅招待一盤炒米粉而已。

緊接著下午二點半開議。「色鬼議員」鼓吹廣開色情業，促銷讓保正來認股的公司制度化，而且可以一邊開會一邊享受性招待：「以株式，招各保正為株主，來會議都可以痲查某，一舉兩得。」「羅經議員」，則建議將當地的帝君廟換名字，自然就可以興旺地方。而「戟古董」則大力批評其他議員的言論，都是本位主義，很多人的發言是站在「鐵道西的話」，只有他自己是「沒有分甚麼鐵道東、鐵道西」。這條將北港郡分為東西的鐵道，指的是大日本製糖會社的輕便鐵道（圖2）。

最後發言的「挑古董」發言總結並導向「獎勵產業」的言論：「庄當局，要置一名老練的專門產業技手，來指導改良土質、種子、耕作法，兼之，副業的養豚事業，也著全力去獎勵。」這番言論贏得媽祖郡長大表贊同地說：「賢哉，挑古董。我返來去，上申會長，表彰[76]汝罷！」

小說文本不僅以誇大的面具來漫畫這些庄協議會，讓官派議員荒腔走板的原形畢露，而結尾也回應了大正民主時代台灣地方政治出現的漣漪。當年台灣文化協會在1927年，左右兩派勢力對決，最後右派另組台灣民眾黨等[77]。小說以調侃的筆調來再現這樣的時代氛圍：

---

75 串耳（chhàng-hīⁿ），指穿耳洞。

76 原文「章」，疑似誤植。

77 張炎憲，〈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09），頁131-159。

> 十年後，田螺王御崩[78]，石頭王坐天。這十年之間平穩的國家，也應時勢的潮流變動起來了。純然文化運動的文化會，也左右分裂。右傾戰不勝了有血氣的左傾，而去再組織政治結社的民黨了。這當中也有甚麼黑色黨、共產黨、農民黨、工友黨，無所不有黨了。十年之中變化這樣速，那末田螺王麼掛羊頭賣狗肉式的自治制，已不合用了。為促進自治制的實現的自治黨，於石頭王坐天當日，也就提出建白書，陳述意見獻策了。石頭王看見了住民，這樣激[79]烈運動，也不得不一番的改革，通牒街庄的古董會改革案了。[80]

官派的庄協議會，在此被露骨地反諷為「掛羊頭賣狗肉式的自治制」。1920年代台灣的知識菁英，顯然發現這種制度的荒謬而群起攻擊，因而興起熱烈討論民主議會等輿論，與實際推行議會設置請願等政治活動。台灣文化協會，即小說寫的「純然文化運動的文化會」，而台灣民眾黨，就是「民黨」。當時風起雲湧的組黨，也被調侃為「甚麼黑色黨、共產黨、農民黨、工友黨，無所不有黨了」。最後也回應當時議會請願運動的訴求，而石頭王（石塚總督）也因而要改革「街庄的古董會」。但是這種舉世無雙的議會，如何被改革呢？肥力爺最後癲狂了，因為他悍然拒絕民主，欺負農民的態度，被宣判「犯著不忠、不義、不仁三大罪」，而宣告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午時三刻」必須上絞臺：

> 這世界沒有的古董會員，必然如前重任。全庄住民皆冷靜地看看石頭王的變法如何？至於官報發表，果然也是重任。街談巷議，皆講肥力爺，犯著欺君逆旨大罪，要掠去上絞臺。講，做人講，肥力爺做伊腳豎到在壁壁，尚且計畫提出帝君庄長登記手續呢。唉，上踏斗[81]，將上眠[82]床

78 御崩，是日文漢字，指天皇、皇后等去世的專用語。原文「崩御」，疑似誤植。
79 原文「極」，疑似誤植。
80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十）〉，《新高新報》267期，1931.04.16。
81 即傳統床鋪前的墊腳小臺階。
82 原文「眼」，疑似誤植。

了。[83]

「上絞臺」，如同「刣頭」等台語常用詞彙，隱喻失去職業（頭路）的意思。〈帝君庄秘史〉最後刊登的昭和6年（1931）4月16日，故事裡宣稱的肥力爺上絞臺的時間，「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午時三刻」尚未來臨。顯然，這是一個小說刊登時，或當年讀者閱讀的當下，都仍尚未來到的時間。或許與其說是一種未來預言的小說，毋寧可說是一種藉著文學想像的期許。當年的元長庄庄長芳賀來五郎不僅繼續連任，而且還持續擔任庄長直到1937年。如此，我們也將更深刻明瞭小說（fiction）的特質之一，無論如何總是一種虛構（fictitious）。

這篇充滿喜劇嬉鬧喧嘩，甚至是精力旺盛氣氛的小說，卻讓最後的收尾更顯得沉寂而悲涼。如同唐吉訶德，原先自以為對抗的巨人，最後才知道只是風車而已。雖然可以容許這麼豐富的文學想像力來戲弄這些地方政治人物，最後卻也只能以感嘆的筆調來自我調侃「唉，上踏斗，將上眠床了」，不過是夢一場吧？

五、結語

1930年黃石輝（1900-1945）的一番鏗鏘言論，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台灣話文論戰。然而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學「用臺灣話做文，用臺灣話做小說，用臺灣話做歌謠，描寫臺灣的事物」，該如何落實呢？在鄉土文學論戰的風起雲湧時代，蔡秋桐顯得相當沉默，卻也是重要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帝君庄秘史〉，可說是一篇日治時代北港郡元長庄，描述地方政治發展過程秘辛的台灣話文小說。蔡秋桐身處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在他生長的故鄉，他親眼目睹了基層地方政治的種種亂象。這些台灣的事物，他是以生動活潑的台灣話文，用鄉下人最熟悉不過的民俗詞彙與文學想像去描繪。於是日文的敬語，被戲謔地稱為「圭母屎」。遠赴台北求取官方認定學位的台灣人，變身為「西天回來」、「受了戒」的豬八戒、沙僧。而當年

83 同註80。

夜學會的「高岡校長」，也被戲謔地改為台灣話的「那腳牛那得道和尚」。故事舞臺的北港郡，改為「媽祖郡」。元長庄，化名為「帝君庄」。高高在上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石塚英藏，突然搖身一變為「田螺王」、「石頭王」。乃至歷任元長庄的官派庄長不惜耗費數千圓到處說情，汲汲營營牟取政治官位的嘴臉，也被毫不避諱地調侃嘲弄。如果說這篇小說隱含了「反面寫實」，[84] 那麼它確實可以理解為一種荒誕的文學風格。藉著這些怪異、不尋常的面具，不僅可以逃避當事人對號入座或政治檢查，也可以讓這些地方政治人物被月旦評。藉著小說的文學修辭與想像力的自由，不僅當年的地方政治人物可置於小說的舞臺上被調侃戲弄，而且重新逆寫（write back）了殖民帝國統治台灣的官方說法。1920年代台灣地方政治的官派庄長，透過這篇小說的書寫策略，竟宛若一齣接獲聖旨，叩首謝主隆恩的大戲。而庄協議會，則僅充當中看不中用的「古董」。任憑有齊天大聖大鬧天宮的本領，最後恐怕也淪為被庄長順勢換掉，而改派自己的心腹。還有安插「盲議員的子」、「龜議員的兒」到庄役場工作，以籠絡地方權貴並鞏固外來當權者的權力位置。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全面地要求民眾實踐守時觀念，當肥力爺趕不上準時啟程的公車，好心的農民通知司機停車才讓他得以即時搭上，而他卻嫌棄同車赤腳農民口中「亂亂雜」的檳榔汁，可能會弄髒他的高級紳士禮服。而庄協議會召開時，所有人都準時出席，但是主持會議的日本人長官卻遲到半個小時。在五彩衣著煙霧之下，可說是重寫了當年官派的庄長、庄協議會議員各式荒謬言論，在此緊密地交織為一幅令人嘆為觀止，卻又平行於官方主流之外的對抗論述。

透過《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州祠廟名鑑》、《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地名研究》、《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臺日大辭典》等史料的互文性解讀，可藉此瞭解〈帝君庄秘史〉背後特殊的歷史時刻、台灣地理情境、社會處境的真實。當然小說仍擁有其特許的虛構自由，甚至可以呼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訴求理想，而虛構地想像讓肥力爺上綏臺。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特殊的書寫策略顯然是相當成功；但可惜也因為其成功，

84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頁48。

乃至於直到現在如果不是藉助民俗詞彙、時代脈絡、地方政治生態及其隱喻所輻射意涵的互文性解讀，可能也無法揭開其台灣民主意識覺醒的時代意義。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下）（台北：台灣總督府，1932.03）。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台北：蕃語研究會，1938.01）。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03）。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台南：臺灣日日新報社台南支局，1933）。

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卷6）（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2.03）。

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第八冊・鬮雞）（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

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09）。

溫彩棠編，《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南：台南市藝術中心，2000.12）。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08）。

葉石濤，《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07）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03）。

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二冊・一群失業的人）（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

Auerbach, Erich. Mimésis: La représtation de la réal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Paris: Gallimard. 1968）.

Bakhtine, Mikhaïl. Esthétique et théorie du roman.（Paris: Gallimard. 1978）.

Terdiman, Richard. Discourse/ 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century France.（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二、期刊論文

呂美親，〈論蔡秋桐的台灣話文小說——以〈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痴〉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8期（2009.04），頁9-36。

李敏忠，〈混雜、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0期（2010.04），頁261-290。

施添福，〈日治時代台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卷1期（2001.10），頁1-39。

三、報紙文章

不著撰人，〈奉天宮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3，6版。

蔡秋桐，〈帝君庄秘史（一）〉，《新高新報》249期，1930.12.04。

———，〈帝君庄秘史（二）〉，《新高新報》251期，1930.12.08。

———，〈帝君庄秘史（三）〉，《新高新報》253期，1931.01.08。

———，〈帝君庄秘史（四）〉，《新高新報》254期，1931.01.15。

———，〈帝君庄秘史（五）〉，《新高新報》255期，1931.01.22。

———，〈帝君庄秘史（六）〉，《新高新報》259期，1931.02.20。

———，〈帝君庄秘史（十）〉，《新高新報》267期，1931.04.16。

四、電子媒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來源：http://db2.lib.nccu.edu.tw/view/loginAction.php）。

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歷屆校友名單」（來源：http://r8.ntue.edu.tw/pastalu/01.htm ，2015.8.28）。

臺灣師範大學教職員圖書查詢系統「《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來源：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